

唐诗对峡路景观的诗意建构

杨一恒

【摘要】唐人对峡路多有诗歌吟咏，并从多个层面展开了对峡路景观的诗意建构。在建构峡路渊源的过程中，唐诗强化了其“禹迹”属性，并将之与诗人的行旅体验、时局世势的转折紧密结合，在各种具体情境中追溯峡路之本源。自中唐起，峡路形象经历了从“禹迹”到“蛮江”的偏移，这也折射出唐人对文化失序的焦虑及唐人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与此同时，巫峡作为峡路核心文化景观的地位得以确立；部分唐诗还对峡路中的新景观进行了建构，逐渐塑造出“峨眉—巴峡—巫峡—黄牛峡”这一景观体系。在一些送别诗中，峡路被简化为多样的景观组合，进一步丰富了峡路景观体系的细节。考察上述三个层面的诗意建构，对深入思考诗歌与景观的内在联系、理解文学风景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唐诗 峡路景观 诗意建构 景观文化

【作者简介】杨一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6) 05-0141-15

峡江水路（以下简称峡路）是连通唐代东西版图的交通要线。从广义而言，整个川江在唐人眼中皆为峡路。^① 唐诗中的峡路，多聚焦于渝州至峡州间的长江干流。此江段包含了以三峡为中心的众多山川景物，风光奇绝，兼

^① 参见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5页。

具交通和游览属性，唐人对此有大量诗歌吟咏。既往有关峡江、长江三峡诗路的研究，或者致力于路程的考辨和诗人诗作的梳理与量化分析，或者尝试构建其多维的地理空间，或者聚焦于巫峡或整个三峡江段，揭示文学书写的地域特征与地理渊源。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扎实的成果，但是尚未充分揭示唐诗对峡路景观建构的意义，故本文拟对此展开分析。事实上，唐诗对峡路景观的形塑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建构景观来历与文化脉络、确定核心景观、建构并完善景观体系。探讨上述三个层面，既有助于理解文学风景的生成机制，也可为打造具有文脉延续性的当代山水文化空间提供美学启示。

一、“禹迹”和“蛮江”：对峡路来历的诗意建构

《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疏江时提到了峡江所在的长江水系，这是关于峡路来历最早的文字记载。其文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①又曰：“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梦土作义……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②其中，“沱”“潜”皆为通名，不专指某一条水道，大致以长江支流为“沱”，以汉水支流为“潜”。^③可以说，广义上的峡路水网，被普遍认为经由大禹的疏导而形成。后世每述及峡路的来历，多承续《禹贡》之意。例如，郭璞《江赋》开篇的“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④之语就直接源自《禹贡》，此赋中“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巖駁”^⑤之语也将峡江山水的形成归功于大禹。《水经注》亦承其言曰：“江水又东径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⑥

唐诗有关峡路的吟咏，屡屡提到大禹疏江之事。这些作品既表达了对大禹“经启之功，于今是赖”^⑦的颂扬，又融入了诗人的行旅体验以及对世情变

①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83页。

②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41页。

③ 参见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7页。

④ 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0页。

⑤ 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0页。

⑥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3《江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7~778页。

⑦ 陆贽：《祭大禹庙文》，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58页。

迁的感知，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张力，对强化峡路景观源于大禹的这一认知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陈子昂《白帝城怀古》的“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①和孟浩然《入峡寄弟》的“往来行旅弊，开凿禹功存。壁直千岩峻，瀑流万壑奔”^②都将峡路视作“禹迹”。然而，他们对禹功“于今是赖”的体知，不仅源于抚今追昔的怀古时刻，而且受到了行旅疲惫和忧愁离乡情绪的直接催化。诗人独处荒服深山，身心全系一江之上，或许只有处于此种境地，才会更加感念禹功之茫茫。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中的“峽关险路今虚远，禹凿寒江正稳流”^③在情感表达上与上述作品较为近似。“禹凿寒江正稳流”并非空洞的颂扬和单纯的用典，而是建立在对峡路的现状、行旅的实感等真切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峡路通航条件本不“稳”，此处“稳流”借以表达对舍弟的盛情邀请，而“正”字凸显当下时态，充分体现禹功恒久至今的重要影响。

杜甫在离蜀途中和居夔期间多次在诗中言及禹功，但每次的书写情境都略有不同。例如，《禹庙》一诗写道：“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④在这首诗中，杜甫将“荒庭垂橘柚”的荒寂、“古屋画龙蛇”的庄严同“江声走白沙”的喧腾形成对照，为“疏凿控三巴”的咏叹营造了古今交汇的绝佳氛围。在《瞿塘怀古》中，杜甫写道：“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⑤诗中前六句正反映了峡江奔流而下之景，“月窟”的想象也为峡路的发源增添了虚玄的意味，结尾“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引入对大禹治水之绩的追念，笔触看似刻意，实则通过禹功与“陶钧力”的对照，将沉寂单调的历史叙述与动态奔涌的自然江景相勾连，最终使二者难分彼此。^⑥《移居夔州作》中的“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⑦和《天池》中

- ① 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② 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1页。
 ③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30页。
 ④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82页。
 ⑤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84页。
 ⑥ 商伟认为，在杜甫眼中，“大禹劈山泄洪即辅翊造化之举，与造化彼此难分”。见商伟：《陶冶赖诗篇：诗人与造物》，《读书》2021年第2期，第93页。
 ⑦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29页。

的“直对巫山峡，兼疑夏禹功”^①，都直接关联杜甫“迁居白帝城”^②“诛茅任薄躬”^③的卜居营屋的现实需求。在《柴门》中，对“禹功翊造化，疏凿就鼓斜。巴渠决太古，众水为长蛇”^④的峡路，杜甫更关注的是其“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⑤体现的运输贡赋作用，在不经意间将追怀大禹与忧念时世结合起来。在《寄薛三郎中璩》中，“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⑥这两句诗的情绪背后，包蕴的是杜甫“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⑦的无力。由此可见，杜甫诗中的禹功，既融于峡路景观的摹写之中，又与峡路交通、贡赋意义相系，还关乎己身的安居与志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反复抒写的追念之语，亦与“沧海未全归禹贡”^⑧（《诸将五首》其三）折射的时局形势密不可分，它们不仅流露出杜甫对大唐中兴的希冀以及对其分崩离析现状的忧虑，而且深刻体现了治水叙事背后布土定州、重理天下的重大政治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禹疏江类似的历史书写还有一例，即蜀王杜宇令鳖灵疏凿巫峡之事。《蜀王本纪》曰：“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⑨《本蜀论》亦云：“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壅而蜀水不流，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⑩作为古蜀开国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鳖灵通江”与大禹疏江在叙述框架上颇为相似。不过，“鳖灵通江”虽然在独孤及的《招北客文》、崔致远的《西川罗城图记》、李昊的《创筑羊马城记》等文中出现，但是其作用仅在于追溯古蜀开国的历史，其蕴含的治理水土的政治意义远不及大禹疏江。此外，唐代官方在南渚祭祀中试图建构一条承续脉络，将江神塑造为“奉大禹之休，得蚕丛鱼凫望帝之勋，开明之没玉垒，李冰之穿二江，嘉而保

①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04页。

②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29页。

③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05页。

④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90页。

⑤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90页。

⑥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64页。

⑦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63页。

⑧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51页。

⑨ 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87页。

⑩ 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13页。

之，沃此黎首，水旱不作，于今赖之”^①的传承谱系，似乎有意统合不同的历史话语。显而易见，无论是鳖灵还是李冰，其疏凿之功皆被置于大禹之后，南读大江的由来与存续亦被归为蒙受大禹之休。可以说，在有关峡路来历的诗文建构中，“鳖灵通江”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叙事，其影响力也因此被削弱。“大禹显而鳖灵没”这一事实，既体现了经学话语对杂史叙事的覆盖，以及中心文化对地域文化的统摄，也表明对过去的叙述始终是对当下需求的回应：在唐代繁盛一统的社会氛围中，追念大禹疏江或许更契合唐人宏阔一统的文化心态。

唐诗对峡路作为“禹迹”的强调，有时正源于对峡路“蛮风”甚盛的焦虑。如上文所言，夔州时期的杜甫虽然一再向世人提醒峡路的“禹迹”属性，但是“黔溪瘴远随”（《孟冬》）、^②“绝塞乌蛮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③“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闷》）^④仍不时刺痛着他的神经。这些诗句或诉说夔州地僻近“蛮”，或陈明夔州绝塞边徼之要，使杜甫虽然身处王境，但是始终怀有游离于核心文化之外的警惕与担忧。他扼腕叹息，希图挽救颓势。然而，杜甫借助颂扬禹功而构筑的大唐中兴之梦，终究如峡江之水东流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绵延中晚唐的“夷夏”焦虑。白居易的《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同样体现了这一微妙的心迹变化：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渺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此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流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⑤

① 李景让：《南读大江广源公庙记》，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26页。标点略有改动。

②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4页。

③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57页。

④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6页。

⑤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6页。

此诗作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赴任杭州途中。这首诗开篇将奔流不息的峡江视为大禹劈山泄波的功绩，这是惯常的颂扬之语。然而，随后对大禹“胡为不讫功”的质疑，以及将浩渺的洞庭归因于苗人恃险不役的看法则较为少见。这一认知虽被赵翼评为“书生之见”，^①但其实与诗人行旅所历及彼时的社会心态颇为相契。事实上，白居易此次自京赴杭取道蜀江至洞庭，或许是因为宣武军叛乱致使汴路受阻而不得不改道。^②白居易之所以没有一味颂扬茫茫“禹迹”，或许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紧张局势的影响；而他直将大禹与苗人对立的写法，未尝不是其“夷夏”焦虑的一种反映。

从诗中不难看出，白居易的情绪明显经历了赞大禹功绩、疑禹功未讫、责苗人冥顽、盼神禹复生的变化过程。这种情感变化的背后潜藏着社会心态的微妙转变。随着安史之乱将“胡汉”和谐的局面彻底打破，中晚唐社会始终充斥着“夷夏”对立的情绪，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边徼的关系也颇为紧张。虽然在借山水以歌咏王业的政治需求下，峡路的“禹迹”属性仍然突出，但是在往来峡江的诗人笔下，峡路作为川流于“夷夏”文化区之间的“南国之纪”属性逐渐被放大。唐诗对峡路来历的建构重点也发生了偏移：从之前的大禹疏江叙事中衍生出“源出蕃域”“夷夏江界”等属性。例如，熊孺登的《蜀江水》云：“日夜朝宗来万里，共怜江水引蕃心。若论巴峡愁人处，猿比滩声是好音。”^③此诗题下注“来自蕃界”。^④岷江源出四川松潘一带，其西源郎架岭唐时属吐蕃，此点为唐人周知，但在之前的诗文书写中极少出现。“朝宗”一语双关，既写岷源诸溪流注成江，又喻吐蕃为臣，万里来朝。熊孺登于元和中（806—820）为西川从事，彼时唐蕃对峙，蕃势虽已趋弱，但“朝宗”恐非事实。这种表述反映了熊孺登的文化心理优势及希图维护“夷夏”一体的愿望，而这一愿望本身恰恰反衬出“夷夏”对立的尖锐。

与此同时，峡路近“蛮”的文化疏离感和“夷夏”之界的区隔感，也在中晚唐的诗歌书写中逐渐凸显。峡路沿岸的眉州、嘉州、涪州、夔州等

①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7页。

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242《唐纪五十八》，唐穆宗长庆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19~7820页。

③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451《熊孺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19册，第5页。

④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451《熊孺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19册，第5页。

地，都浸润在“夷夏”相杂的社会环境和诗意建构之中。例如，李频的《眉州别李使君》云：“回首雪峰前，朱门心杳然。离人自呜咽，流水莫潺湲。毒草通蛮徼，秋林近漏天。一生从此去，五字有谁怜？”^①眉州距戎、泸二州尚远，然李频已觉“毒草通蛮徼”，可见其对“蛮徼夷界”的感知距离，远比实际地理距离为近。又如岑参的《初至犍为作》中的“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②这大约是岑参对嘉州地理的初步印象，可知在他心中嘉州距“蛮地”并不远。再如元稹的《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其一云：“胡笳夜奏塞声寒，是我乡音听渐难。料得小来辛苦学，又应知向峡中弹。”^③诗中所言“胡笳夜奏”代指涪州的“蛮曲夷歌”，而“是我乡音”的古琴却“听渐难”。正因如此，诗人乍然听得有人抚弄“小来辛苦学”的古琴才格外欣喜，这与元稹在《立部伎》等诗中的态度是一致的，亦可见诗人对文化面貌变化的焦虑。

总而言之，唐诗对峡路之为“禹迹”的多角度吟咏，极大强化了峡路源于大禹疏江的认知。这些诗作蕴含丰富的感情体验与复杂的社会感受，它们的广泛传播使这一景观来历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峡路核心景观的确定与景观体系的生成

峡路迂回漫长，景迹甚多。某些景观被大量吟咏，受到充分关注，另外一些却被世人普遍漠视或回避。先唐诗歌已初步确立峡路景观的中心，即以神女传说为核心的巫峡。一些典型的地理景观，如巫山、神女峰、楚宫、阳台等，已初具意象化特征。同时，滠滩堆和黄牛峡作为峡路景观的两个次中心，与巫峡共同构成了峡路上的一组景观焦点。总体而言，先唐的峡路吟咏主要集中于巫峡，对其他景观尚未予充分关注。彼时唐人对峡路景观的诗意观照，一方面将巫峡确定为峡路的核心文化景观，另一方面试图改变既往的观照焦点，发掘和丰富新的景观，进而生成峡路的景观体系。

“巫山神女”故事基于地域民间信仰和特殊自然人文环境的结合，其神话属性与其自身的自然、人文地理特质紧密相融。^④换言之，巫峡很早就从

①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774《李频（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32册，第137页。

②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93页。

③ 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4页。

④ 参见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08~209页。

单纯的地理空间转变为“神迹”与人文传说的结合体。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对“巫山神女”故事的演绎，^①又使巫峡进入文学话语，此后经过历代文本的积淀，使巫峡逐渐从“神迹”转化为“诗迹”，成为峡路最瞩目的景观。《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一例，其事真伪或难定论，却很好地展现了唐人将巫峡视为峡路核心景观的认知：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②

唐代秭归县神女祠壁上所题写之诗，至长庆年间已逾千首。数量甚多的诗作使神女祠化身为立体的巫咏总集。这也解释了繁知一为何断言白居易“行到巫山必有诗”，除巫峡风景绝胜足以触物兴感，大概还有两点原因：一是巫山神女祠（馆）为唐代峡路水馆之一，^③白居易溯江赴忠州极有可能曾停舟巫山之下；二是文人对巫峡的偏爱已形成了咏巫传统，繁知一默认白居易必然会在此传统召唤下登临巫峡名胜。繁知一如此笃定的态度，正说明了巫峡作为峡路核心景观的地位。

然而，繁知一的笃定最终落空，与白居易的搁笔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巫峡“诗迹”先入为主地占据了访客的视野，规定了感知的范围，甚至压缩了其边界，刘禹锡的“怯而不为”和白居易的“竟而不为”，既有意尝试打断峡路书写传统的承续，也促成了对这一传统的演化与更新。刘禹锡虽然有《巫山神女庙》诗，但是全诗因循旧语，冯班谓之“常调”，纪昀则直言“此种已是宋诗，设题下换宋人名字，不知如何唾骂耳”。^④此诗之平庸也从侧面解释了刘禹锡“怯而不为”的原因。翻检《白氏长庆集》，可知其峡路途中之诗多

① 参见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9页。

② 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卷上《巫咏难》，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12页。

③ 神女祠即神女馆，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115页。

④ 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43页。

对巫山、巫峡选择性漠视，而以瞿塘峡、白狗峡、黄牛峡、使君滩等为着重描写的对象。白居易知忠州期间也多咏巴峡风光，尽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观景方式。实际上，唐诗对峡路新景观的塑造，其动力正来自这种推陈出新的尝试，并由此形成了以下几种书写现象。

其一，唐诗对巴峡景观群的塑造。巴峡之谓，乃唐人新创。渝州、涪州段诸峡，因为其位于巴国或巴郡境内，所以常常统称为巴峡。然而，巴峡的范围不时逸出，有时指瞿塘峡、巫峡，有时可涵括渝州至峡州间的诸峡。这种范围“失焦”的情况颇为常见。例如，沈佺期的《过蜀龙门》和陈子昂的《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这两首诗虽然都缺乏对小景点的具体摹写，但是通过“行”“入”“出”等动词，凸显了巴峡景观的地标意义。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① 堪称这一效果的最佳体现。同时，唐诗有时还会聚焦于黄草峡和明月峡等渝、涪间的具体峡江景观。尤其是明月峡，因为其富有诗意的峡名极具美感，所以常作为巴峡的代表。明月峡有时还简称月峡，如李白《荆门浮舟望蜀江》“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② 杜甫《奉赠射洪李四丈》“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③“月”本就是诗歌中行旅的典型意象，头顶孤悬的明月，既带来具象的时间感，又牵动着诗人无尽的思绪。明月峡之名，与离别、相思之情紧密融合，这使其在大量峡路游览的亲历行为催化下，轻易地脱离其地理实体而获得符号化的审美效果。

其二，唐诗丰富了与黄牛峡相关的景观组合。黄牛峡岩石高耸、色泽发黄且形态奇异，加之水流迂回，本身即构成奇特的自然景观，而《三峡谣》的传播又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六朝起，黄牛峡频入诗中。与此同时，六朝诗歌格律渐兴，山川之景常以对仗形式组合入诗。“黄牛”对“白马”、“黄牛”对“白帝”的语言形式，既满足了词性、颜色的对仗要求，又通过一组地理节点简洁地勾勒出峡路空间的深远感。正因如此，黄牛峡成为峡路中难以替代的景观。唐人在此基础上又创拟了“白狗”对“黄牛”等新的对仗组合，如杜甫《独坐二首》其二的“白狗斜临北，黄牛更在东”，^④ 白居易《发

①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71页。

② 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7页。

③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53页。

④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0页。

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中的“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①都省略了“峡”“滩”等中心语，直接以动物的野性与毛色象征凌厉的黄石和湍急的白滩。这两首诗不仅通过地名对仗令峡路空间伸缩变幻、极富张力，而且将地名的对仗转化为动物的对仗，在文本层面形成颜色的碰撞与物象的相类，生成奇妙的美感张力。

其三，唐诗建立了峨眉山与巫峡的景观组合。峡路位于巴蜀与荆楚两个文化区域之间，而最能代表这两种地域文化的莫过于峨眉山和巫峡。峨眉山月浸润在蜀中浓郁的佛道氛围里，而巫山神女则沉淀于楚峡内的巫鬼神话中。齐己的《送朱侍御自洛阳归阆州宁覬》云：“寻常西望故园时，几处魂随落照飞。客路旧萦秦甸出，乡程今绕汉阳归。已过巫峡沉青霭，忽认峨眉在翠微。从此倚门休望断，交亲喜换老莱衣。”^②这首诗以四个地名景观与“已过”“忽认”等动词串联，生动描绘出朱侍御自洛阳赴阆州的情景。溯长江入蜀，巫峡既为必经之地，亦为峡路绝胜之处。阆州虽然位于东川，朱侍御途中恐难实见峨眉山。齐己此处实际上是将峨眉山视为整个巴蜀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景观。“已过巫峡”意味着离楚，“忽认峨眉”则象征着入川。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③与晁域《怀齐己上人》的“峨眉山色侵云直，巫峡滩声入夜长”^④，分别以“三峡”“巫峡”对举“峨眉”，虽然取用范围稍有不同，但是都通过峨眉山与峡江景观的对仗来营造意境，展现了峡路穿行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遥远与漫长。

由此，唐人建构的峡路景观已初步呈现“峨眉—巴峡—巫峡—黄牛峡”的由西到东的地理空间体系，即以巫峡为核心景观，西溯至巴之巴峡、蜀之峨眉，东延至楚之黄牛峡，以此四点为中心，辅以沿线其他的峡景、山景和江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景观体系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唐人知识体系和景观书写形式的影响：一方面，唐人对使君滩、黄牛峡等峡路景观的关注，很可能受到类书景观知识结构的影响；^⑤另一方面，除了借助律诗的对

①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83页。

② 王秀林：《齐己诗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③ 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19页。

④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1090《前蜀三十六·释晁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43册，第665页。

⑤ 唐人的地理书写，可能从类书中获得零碎的地理信息以及类型化的词句与意象。峡

偶营构空间感，唐人还善于利用地名景观的对仗，通过调整其在文本中的语序，制造与现实地理空间或重合或错位艺术效果，进而在文本中灵活地调控峡路的空间距离、行旅速度及旅人心情。这一点在唐人的峡路送别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三、景观体系的细化：峡路送别诗中的景观组合

如前文所述，峡路是连接大唐东西版图的重要交通水道。除了往来巴蜀、两京者取道峡路，更有在巴蜀与荆楚、巴蜀与黔中、巴蜀与吴越间循峡路往返者。如此多的人员流动，催生了大量的送别诗。此类诗作，既有对送别地和目的地的地理意象、人文故事的关注，也有对途中峡路的观照与想象。面对漫长迂回的峡路，唐人常以丰富多样的景观组合展现峡路轮廓与行旅动态。作为峡路唐诗最丰富的题材，送别诗的景观组合方式最为多样，行旅的快慢、路况的好坏、旅人的观景视角与心情，均可通过景观组合的排列次序、意象密度等予以细腻呈现。与此同时，前文所论的“峨眉—巴峡—巫峡—黄牛峡”这一峡路景观体系，也在迎来送往间不断得到增补、细化与完善。

多数峡路送别酬赠诗作，作者并无亲身行旅体验，其峡路记忆难以如图经般精准详尽，因此他们往往只遴选最具标志性的地名与风物意象来建构峡路剪影，如白居易的《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辟命》：

见说瞿唐峡，斜衔滟滪根。难于寻鸟路，险过上龙门。羊角风头急，桃花水色浑。山回若鳌转，舟入似鲸吞。岸合愁天断，波跳恐地翻。怜君经此去，为感主人恩。^①

路中的一些景观，经由类书的收录，成为峡路吟咏的中心，不仅引起亲历者的关注，而且为神游者打开了通向殊方的想象之窗。“使君滩”和“黄牛滩（山）”这两个词在初盛唐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中均有记载，唐诗中的“使君滩”与“黄牛峡”大多导源于此，有的诗径直取用其句，有的则在书载基础上延展想象。参见徐坚编：《初学记》卷6《江第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5~126页；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7《山部上·总载山》、卷8《水部上·江水》、卷56《杂文部二·诗》、卷94《兽部中·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58、1011、1627页。

^①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70页。

该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江州司马任上。彼时白居易尚未知忠州，全诗以“见说”起笔，点明诗中峡路景致皆在“见说”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此处“见说”兼具两层含义：第一，听闻往来巴蜀旅人口述峡江舟行险境；第二，阅读前代地理典籍诗文，形成对蜀峡险途的认知。白居易谪居长江沿岸的江州，或有机会遇见来自或曾至巴蜀之人，听其讲述舟旅之险获知峡路实景；同时，前代峡路书写已成传统，亦让诗人不必亲历便可铺陈峡景。该诗状拟峡路颇有章法，山峡与江水组合相对，连下十句。全诗整饬有余而变化不足，犹如复述“见说”之内容。内容虽然有“鳌转”“鲸吞”之比喻、“天断”“地翻”之夸张，但是仍流于陈言，似未见新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前文论及的白居易巫峡搁笔之事，皆可印证中唐峡路景观体系已初具其形。

对峡路沿途重要地名、风物与景致的想象，是峡路送别诗的重要内容。其中旅途描摹较为细致者，当数张祜的《送蜀客》：

楚国去岷江，西南指天末。平生不达意，万里船一发。行行三峡夜，十二峰顶月。哀猿别曾林，忽忽声断咽。嘉陵水初涨，岩岭耗积雪。不妨高唐云，却借宋玉说。峨眉远凝黛，脚底谷洞穴。锦城昼氲氲，锦水春活活。成都滞游地，酒客须醉杀。莫恋卓家垆，相如已屑屑。^①

此诗开篇点明送别之地和远行目的地，在交代两地空间关系的同时，也显出旅途之遥远。接着诗人溯江神驰：小舟夜入三峡，一路去向西南，终至锦城。全诗皆为想象之语，沿途之景次第相连，宛如亲身溯江而行。不过，如此诗般铺叙峡路全程行旅风貌的送别诗并不常见，多数诗人仅选取一组或两组典型峡江意象组合以勾勒峡路风貌，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部分诗人通过离人沿途地名、景致的对仗，在诗句流转间清晰铺展旅人的行迹。例如，杜甫《送十五弟侍御使蜀》的“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②这两句诗，不仅以“数杯酒”和“百丈船”反映出送别之悲和溯行之苦，而且巧妙地通过“巫峡”和“内江”的地名对仗，完成送别场景与入蜀旅途的空间切换，含蓄道出相聚短暂、时光易逝的怅惘之感。又如张祜《送杨秀才游蜀》的“鄂渚逢游客，瞿塘上去船。峡深明月夜，江静碧云天”^③和

① 张祜著，尹占华校注：《张祜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42~443页。

②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66页。

③ 张祜著，尹占华校注：《张祜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李商隐《送崔珣往西川》的“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① 分别将出发地与到达地、途经地与到达地融于篇内，通过一组地名景观的对举，以目纵万里的笔触，体现出峡路之漫长、空间之阔大。^② 这些诗中的地名、景观，皆循行旅者的路径次第叙写，仿佛借诗笔追踪着行人匆匆的羁旅征程。然而，还有一些诗通过打乱行旅者沿途行地名组合顺序，打破顺向空间叙事逻辑，形成某种逆向的空间逻辑与情感表达。例如，白居易的《得行简书闻欲下峡先以此寄》：

朝来又得东川信，欲取春初发梓州。书报九江闻暂喜，路经三峡想还愁。潇湘瘴雾加餐饭，滟潏惊波稳泊舟。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③

此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彼时白居易仍谪居江州，其弟白行简则欲罢东川节度使僚佐，自梓州前往江州。白行简先寄书信与兄，白居易复诗以代书送行。颌联先抒“书报九江”之喜，复愁“路经三峡”之险；颈联先叮嘱白行简路过“潇湘”时“瘴雾”密布，需“加餐饭”以保身，再提醒其舟行“滟潏”，遇到“惊波”时需稳健泊船。白行简自梓州至江州，显然顺嘉陵江、长江而下，白居易刻意倒置上下游空间顺序。两联在空间逻辑上的逆向，正关合了结尾“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的情感表达，兄弟渴望团聚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又如杜甫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峡》“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④ 和《送韩十四江东省覲》“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⑤ 皆系东川送人下峡之作。诗中悬想崔、韩二人顺流而见之景，却笔锋迂回，先及下游的秭归白狗峡和峡州黄牛峡，再回述上游的巫山神女祠和白马江，将峡路的迂远与旅途的艰辛巧妙地表现出来。岑参《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的“城边宋玉宅，峡口楚王台”^⑥ 先道泉少府目的地江陵的“宋玉宅”，再言途中经过的巫峡“楚王台”，也是为了突出卫伯玉“甚爱才”“待君来”^⑦

①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56页。

② 对离人所往之地的想象铺叙，诚为唐人送别诗中颇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参见许智银：《唐代送别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70页。

③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59页。

④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86页。

⑤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04页。

⑥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77页。

⑦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77页。

的真诚与迫切。

第二，有的诗人只选取峡路中的一个代表性景观，既作为地理标识，又借以指代峡路全程，尤其喜欢以三峡或巫峡代称峡路。例如，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的“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①就将李少府的峡中贬途和遭贬心境约化为巫峡猿啼和白帝木疏这两种典型的孤寂落寞的意象。又如白居易作于忠州的《送客归京》：“水陆四千里，何时归到秦？舟辞三峡雨，马入九衢尘。有酒留行客，无书寄贵人。唯凭远传语，好在曲江春。”^②其中，仅凭“舟辞三峡雨，马入九衢尘”这两句，就勾勒出蜀客“水陆四千里”归京的场景。此外，以下四首诗亦值得注意。

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王昌龄《卢溪别业》）^③

若从巫峡过，应见楚王神。（岑参《送周子下第游荆南》）^④

巴峡吟过否，连天十二层。（贾岛《送崔定》）^⑤

如从十二峰前过，莫赋佳人殊未来。（吴融《送僧上峡归东蜀》）^⑥

以上这四首诗写法颇为相似，皆在末二句点出行旅者可能经行的峡路景观。王昌龄和吴融劝慰友人不要因巫峡的萧瑟景观而陷入愁绪。而岑参和贾岛则希望友人留意途中巫峡十二峰的奇绝美景。四人都以向导式的口吻，既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心，也体现了自己对峡路地理的熟稔。同时，这种在结尾处聚焦于核心景观的写法，也无疑影响着峡路景观体系的塑造与完善。

第三，有的诗人并不以具体的地名和景观为悬拟的对象，而是借助巴江、峡云、峡月、峡雨、峡猿、江风、楚峡等意象，勾勒出既有鲜明地域色彩又笼统模糊的峡路剪影。这类送别作品鲜见行旅者沿途地名、名胜、交通等信息，对地理意象的描绘更多在于渲染峡路的艰辛难行与行旅者的孤寂忧愁。

①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②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57~1458页。

③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148《王昌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6册，第219页。

④ 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57页。

⑤ 贾岛撰，齐文榜校注：《贾岛集校注》，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7页。

⑥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889《吴融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36册，第414页。

例如，李白《送友生游峡中》的“峡里闻猿叫，山头见月时”、^① 卢纶《送夔州班使君》的“万岭岷峨雪，千家橘柚川”、^② 武元衡《送兄归洛使谒严司空》的“楚峡绕云雨，巴江足梦思”、^③ 吴融《送薛学士赴任峡州二首》其二的“片帆飞入峡云深，带雨兼风动楚吟”^④ 等皆属此类。以上诗句通过对离人去途所见景观的想象，拉近了送别者与离人间的心理距离，在同理心的基础上强化了二者的情感共鸣，更显出送别者的关心呵护。这种送别者与离人之间的情感结合，正是通过景观组合传递出来的。

四、结语

唐诗对峡路景观渊源、核心景观及景观体系的建构，呈现了文学风景生成的复杂内涵与多重层面。对峡路渊源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叙述山川来定义秩序与认同的话语实践，其中交织着经学叙述与杂史记载、中央视野与地方感知等多重张力。峡路形象在“禹迹”与“蛮江”之间的偏移，既体现了唐人宏阔一统的文化心态，也蕴含其对文化失序的焦虑，以及构建文化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样的诗意建构既丰富了峡路的历史内涵与文化记忆，也对借助景观叙事确立当代文化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唐诗对峡路景观的形塑，其意义不仅在于细致摹写山水形胜，还在于通过诗性的空间感知与审美体验形成较为清晰的景观标识与组织逻辑。其中，核心景观凝结了唐人对峡江景观的审美提炼与符号化塑造，而景观体系则完成了对沿岸重要景观的诗意串联与整合。这种凝练符号、形塑体系的建构思路，既有助于对峡江山水文化空间的审美阐释，也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一条融合诗意审美与空间实践的人文路径。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416页。

②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408《卢纶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17册，第119页。

③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448《武元衡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18册，第391页。

④ 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889《吴融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36册，第407页。